

歷史何以終結？

● 單 磊



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 著，王憲明等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二十世紀前期，「歐洲中心論」依然處於強勢地位。百餘年來，不斷有學者試圖衝破其藩籬，重構歷史敘事範式，希冀論證「歐洲中心論」的不合理性，服務於日漸崛

起的民族國家。民族主義被用於新的敘事範式來建構以民族國家為歷史主體的宏大敘事。民族國家的崛起和民族主義話語的增強猶如一股摧枯拉朽的洪流，滌蕩着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艱難維持的舊秩序。

美國史學家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 的代表作《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最早於1995年由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2003和2008年在中國大陸分別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和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簡稱《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引用只註2003年版頁碼)就試圖剖析這樣一場思想與範式的變革。作者開篇就說：「現代社會的歷史意識無可爭辯地為民族國家所支配。」(導論，頁1)這是全書的主旨。此論題得以成立可能源於「啟蒙歷史使民族國家把自己看做是一個存在於傳統與現代、等級與平等、帝國與民族國家的對立之間獨特形式的共同體」(導論，頁2)。

二十世紀前期，「歐洲中心論」依然處於強勢地位。百餘年來，不斷有學者試圖衝破其藩籬，重構歷史敘事範式，希冀論證「歐洲中心論」的不合理性，服務於日漸崛起的民族國家。

「新史學」的核心是民族主義，其目的是保國救民，方式是新的歷史敘事，尤其是歷史分期。梁啟超的〈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可以被視為二十世紀中國民族主義史學的濫觴，杜贊奇的論述起點正是梁啟超及其代表作。

在這裏，作者認為，在啟蒙歷史敘事的桎梏下，民族國家是一個具有集體人格的新歷史主體，在近代中國扮演着積極主動的角色。而作為敘事的歷史不僅是認識的透明媒介，更是一種使歷史人物，尤其是從事歷史敘事的歷史學家，「得以用來阻礙、壓制、利用其他講述過去和未來的方式，或在某些時候與這些方式進行協調」（導論，頁3）的話語。

毫無疑問，「民族歷史把民族說成是一個同一的、在時間中不斷演化的民族主體，為本是有爭議的、偶然的民族建構一種虛假的統一性」（導論，頁2）。此書一經出版，立即引起軒然大波，雖然褒貶不一，但無一例外都認識到它的價值。這是它的成功之處，恰如布洛赫所言：「史學的不確定性正是史學存在的理由，它使我們的研究不斷更新。」（布洛赫[Marc Bloch]著，張和聲、程郁譯：《歷史學家的技藝》[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頁18。）

杜贊奇是一個介於現代和後現代之間的學者，他要完成的是從以因果律闡明和目的論敘事方式到意義闡釋和非目的論敘事方式的範式轉換。不管我們是否同意杜贊奇的觀點，都不能否認此書是對民族國家崛起背景下重構宏大敘事範式的有益嘗試。近年來，後殖民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瀰漫國內外史學界，有人認為二十世紀初「新史學」漸成現代輪廓之時，複雜的國內外形勢和民族國家建設摧毀了「新史學」，導致所謂「喪鐘敲響」、「歷史終結」。

筆者實難苟同。重溫《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尤其是關注其頗具民族主義色彩的歷史敘事顯得異常必要。

歷史學家從事歷史研究是否必須以求得真理或獲取真實為旨歸？具體到近代中國特殊的歷史環境，如何調和歷史敘事與民族主義的關鍵是在於繼續秉承中國古代史家直書、實錄的優良品質，還是以歷史敘事為武器服務於日益崛起的民族國家？在二十世紀前期實證之風日熾的主流史學思潮中，此問題似乎不成問題。然而，杜贊奇筆下的史學家卻一反常態書寫「非真實」的歷史，這其中就包括傅斯年和顧頡剛等長期被視為自由主義者的史家。

我們當然可以高談民族主義，因為這往往被視為「愛國」；我們也可以闊論「還歷史以真面目」，因為它常常被視為「清流」。晚清民國的知識精英們因此陷入兩難之境：一方面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自強；另一方面，還要警惕危重的民族危機。傳統良史觀念和當時境況雙重背景下形成的話語場，決定了追尋真理與史家救國的衝突。民族主義話語主導的歷史敘事不可避免地掩蓋了歷史真相，因而遭到不少人士的批駁。但是，當我們自覺運用歷史主義這一評價武器時，我們不禁要問：歷史認識的「求真」究竟求到甚麼程度？杜贊奇到底要拯救怎樣的歷史？

胡適、傅斯年、顧頡剛等是在努力打破舊的史學模式，而梁啟超、何炳松、汪精衛等則試圖構建新史學模式。「新史學」的核心是民族主義，其目的是保國救民，

其方式是新的歷史敘事，尤其是歷史分期。梁啟超的〈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可以被視為二十世紀中國民族主義史學的濫觴，杜贊奇的論述起點正是梁啟超及其代表作。傅斯年也運用了這一虛擬的分期模式：

傅斯年使中國歷史服從普遍規律，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對未來的預測，這一方法可以理解為對中國過去的非歷史主義化。然而，傅斯年同時又懷有民族主義訴求，希望中國能平等地列居世界民族國家之中，此一訴求與他自己的方法論預設矛盾，他因此之故一次又一次被捲入民族主義的政治行動之中。（施耐德[Axel Schneider]著，關山、李貌華譯：《真理與歷史——傅斯年、陳寅恪的史學思想與民族認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頁1。）

民族主義話語與新歷史考證學派倡導的「史學便是史料學」表面上看是相悖謬的，實際上是一種客觀存在的潛流。我們又面對另外一個問題：如何對貌似自相矛盾的思想進行公正無私的評判？我們不得不承認，二十世紀前期的「新史學」與以救亡圖存為價值取向的致用史學在歷史敘述的實踐中是吻合的。杜贊奇藉此提出了疑問：「或許歷史材料只是喧嘩的『噪音』，其意義需靠歷史學家通過敘述來『象徵』性地揭示？」（頁13）。他坦承：「本書的目的不是為了找回來被污染的、原始的中國史，而是為了確定一個場

所，在那裏，多層次的敘述結構或是在攝取歷史之真或是在同歷史之真掙扎，而歷史之真除了通過敘述象徵以外是不可得知的。」（頁14）可見，他並不拒斥歷史主義思維，作歷史評價時希冀把事物放在所處的「場」，這樣才能理解其浮華的喧囂，進而透過表面找尋歷史之真。

傳統良史觀念與古今一大變局的張力使得不少民族主義史學家具有難以調和的矛盾性。恰如杜贊奇所言，「謙遜與自我使命是這一動亂與流血時代的知識份子中大多數人的特點」，縱然是顧頡剛這樣當時中國最穩健的知識份子，都感到「重新把國民鑄造為主權國家的基礎是時代的當務之急」（頁92），主張重新與歷史傳統建立聯繫。孫中山利用民族主義意識組織會黨給了杜贊奇靈感，他在「兄弟會與革命中的革命話語」一章中評論道：「當19-20世紀之交這一全球性話語在中國扎根時，迅速成為此後20年間中國知識份子最重要的話語工具，直到反帝的修辭和倫理取而代之為止。」（頁130）

而在整個民族文化水平有限的情況下，必須有強勢歷史活動主體領導方能發揮這個古老民族的潛能。那麼，這個歷史主體是甚麼呢？杜贊奇認為，在當時中國，要想把這種話語改造成為激發民族自強的學說，只能以日漸崛起的民族國家作為歷史主體行使這種獨特權利。幸運的是，「中國知識份子參與到了一個國際性的話語體系之中，同時，革命的知識份子對話語進行了改造，以便使之適合於中國

二十世紀前期的「新史學」與以救亡圖存為價值取向的致用史學在歷史敘述的實踐中是吻合的。杜贊奇並不拒斥歷史主義思維，作歷史評價時希冀把事物放在所處的「場」，才能理解其浮華的喧囂，進而透過表面找尋歷史之真。

史料和歷史敘事同樣具有極強的黨性。只有在殘酷鬥爭中勝出的人才能生產甚至篡改史料。從這點講，民族主義支配下的革命化敘事維護了歷史的正義和史家的良知，對殖民話語支配下的歷史敘事起到「祛除巫魅」的作用。

的實際，從而使自己能夠編織出一部天衣無縫的國史」(頁130)。

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民國新史學家中的旗杆人物顧頡剛、傅斯年、雷海宗等為甚麼以歷史分期作為武器，向歐洲和日本歷史敘述結構的霸權模式進行堅決的鬥爭。我們也應該理解梁啟超為宣揚新法而作〈譚嗣同〉、汪精衛為宣揚革命而撰〈民族的國家〉，如此不過是試圖論證維新派和革命黨人拼命建立的是這麼一個作為歷史主體的民族國家。維新派和革命黨人把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線性歷史的國際話語消化並使之本土化，建立了在世界生死格局中不斷進步的中國。

由此觀之，歷史的確是一種手段、一種工具，其求真的「體」與致用的「用」，在歷史敘述的天平中無法永遠保持平衡，縱使最優秀的史家也不行。在爭取民族獨立和追求現代化同時展開的近代中國，這似乎是一種宿命：「在既想屬於過去又想與過去決裂的倡導者之間，歷史敘述結構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趨勢。」(頁75) 民族主義話語是反真實的卻又是最革命的。民族國家崛起之後，具有強烈民族主義意識的史家自覺運用這一武器紛紛走上史家救國的道路。

反觀當代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求真之風日盛，追求所謂「純學術」似乎成為史學工作者自我標榜的不二法門，並且取得了巨大的勝利。研究三元里抗英運動不再分析它的歷史場景，而去考證到底殺死了三個或五個英軍；研究第二次鴉片戰

爭不再考慮其隱含的歷史動因，而是不厭其煩地討論所謂「國際法」；研究甲午戰爭不再燃起馬革裹屍的雄心壯志，而在是否「與國際接軌」上大做文章。諸如此類，讓人痛心疾首！

在近現代史敘事中，淡化歷史具有歷史正當性。歷史學必須走出書齋，擔負起正義和自強的責任。誠如學者何新所言：歷史學是一門能夠「塑造民族整體人格，表述民族自我意識、自我評價和自我認知的偉大學術」，而歷史意識則是建構「國民意識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內容，關係於現代政治國家的某些根本價值」(何新：《論中國歷史與國民意識：何新史學論著選集》[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頁5-6)。在後殖民主義和「歐洲中心論」的強勢話語壓迫下，我們偉大的歷史研究實在不應當把所謂「求真」懸為治史鵠的。

動輒有人提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建立在堅實的史料基礎上，似乎如此其結論就顛撲不破了。殊不知，史料具有極強的黨性，歷史敘事同樣具有極強的黨性。只有在殘酷鬥爭中勝出的人——不管他們用甚麼手段，也不談甚麼成王敗寇——才能生產甚至篡改史料。歷史不會讓人感到枯燥，因為它的大部分是活人在講他們的英勇事迹，「總的來說，歷史是成功者的記錄，而不是失敗者的記錄：在這個意義上，歷史顯然是一個成功的故事。」(卡爾[Edward H. Carr]著，陳恆譯：《歷史是甚麼？》[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230。)如此看來，歷史

真相早已被塗抹得面目全非！假使我們真的「告別革命」，那後世子孫真的會被永遠誤導。從這點講，民族主義支配下的革命化敘事維護了歷史的正義和史家的良知，對殖民話語支配下的歷史敘事起到「祛除巫魅」的作用。

死去的人無法開口說話，活着的人望着自己豐盛的戰果，以勝利者的姿態肆無忌憚地奚落、嘲諷死去的人無知、卑微、孱弱不堪。因此，活着的人是罪惡的，儘管代表所謂「先進」。活人的手上沾滿了血腥，審判着死人的靈魂——勝利者書寫歷史，「先進者」踐踏歷史！歷史的評價終歸是強者對弱者的審判，是歷史和現實利益的既得者喪失人性的無病呻吟。

歷史學不斷遭受厚黑學的侵蝕，愚昧的史家不自知而去助紂為虐，中國近代史翻案成風就是明顯例子。有人聲稱辛亥革命是反動的，革命黨武裝起義和孫中山當選總統是不合法的，袁世凱代表所謂進步的生產方式，因此應當貶孫揚袁。乍一聽，貌似以先進生產力的維護者自居，實際不過是新時代迷失自我的高級牢騷罷了。革命黨和孫中山當然是不合法的，也正因此才顯得那個時代稀缺罕見的偉大。導致國家殘破衰敗、民族幾於滅種的舊秩序就需要這種偉大的「不合法」行為來打破！袁世凱賣國求榮、颯顏復古，作為民族公敵理應受千夫所指、萬眾唾棄。所謂能否代表先進生產方式根本不能作為主導標準做出合理的歷史評價，能否維護並發展人類數百萬年積澱下來

的文明水準才是超拔於庸俗之上的合理標準！否則，卑微難以遏制，「侵略有功論」、「漢奸光榮論」等更會甚囂塵上，人類的最終文明成果將會毀於朝夕！

歷史評價是死人與活人的交易。活人利用自己活着的既得地位，依靠給陰司的死者正名，獲取自己在陽間的權利。歷史學如何調適、規範無知利己存在者的行為？是服膺於既有的生死格局，還是維繫人類文明的水準？二十世紀前期有良知的史學家深入思考過這一問題並最終找到了解決的鑰匙：以民族國家作為歷史主體從事歷史敘述。民族主義史家巧妙地運用敘事技巧，促使民族國家走上現代化的坦途，這也意味着：「中國歷史只要寫得好且分期得當，中華民族就是世界上唯一真正延續不絕的歷史性的民族。」(頁28)

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所言「一切真歷史皆是當代史」長期遭到誤讀。或許是用來反抗偏頗卻又強勢的「革命範式」，史家主體有意突出現代化敘事而在「一切真歷史皆是當代史」上大做文章。事實上，他們不惜歪曲克羅齊本意，僅僅將其作為一種思想資源以達到自身利益訴求的目的。如果非要說「歷史終結」，那就是對後殖民主義和「歐洲中心論」神像迷信的終結，而絕非克里奧女神生命力的衰竭。誠然，近現代中國面臨古今一大變局，關注者甚眾，研究成果積累深厚，再有所突破確實困難，於是，亂翻案成為學術成果的「增長點」。史學工作者何時才能擺脫這一窘境？

誠然，近現代中國面臨古今一大變局，關注者甚眾，研究成果積累深厚，再有所突破確實困難，於是，亂翻案成為學術成果的「增長點」。史學工作者何時才能擺脫這一窘境？